



青年学者文库

官话方言方位词 研究

陈瑶 著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青年学者文库

官话方言方位词 研究

陈瑶 著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官话方言方位词研究/陈瑶著.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4. 11
(青年学者文库)

ISBN 978-7-307-14597-9

I. 官… II. 陈… III. 官话—名词—方言研究 IV. H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42270号



责任编辑:赵财霞

责任校对:鄢春梅

版式设计:马佳

出版发行: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件:cbs22@whu.edu.cn 网址:www.wdp.com.cn)

印刷:湖北省荆州市今印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880×1230 1/32 印张:7.125 字数:184千字 插页:2

版次:2014年11月第1版 2014年1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307-14597-9 定价:22.00元

版权所有,不得翻印;凡购买我社的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作者简介

陈瑶，女，湖北省武汉市人，深圳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擅长汉语教学与研究。

1993年、1996年、2001年分别于武汉大学中国语言文学专业、华中师范大学现代汉语专业、暨南大学汉语言文字学专业获得文学学士、文学硕士、文学博士学位。撰写论文21篇，分别发表于省级和国家级核心刊物，总字数20万字；其中2篇被《复印报刊资料·语言文字学》全文转载，4篇被CSSCI索引，《〈普通话水平测试大纲〉轻声词刍议》被广东省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评为普通话水平测试优秀论文三等奖。1999年获得国家普通话水平测试员证书，2003年获得对外汉语教师资格证书、HSK主考证书。

序

汉语的方位词成员不多，能量却不小。在浩瀚的词汇之中，方位词不但资历很老、辈分很高，使用频度也是名列前茅的；就词义和构词来说，方位词往往有本义、引申义、虚化义，组词能力很强，生成了不少复合词；就语法功能来说，方位词还兼有多种词性，和诸多词类组成各种词组，在句子里充当多样的成分。由于用法的不同，方位词在语音上也不乏变化。正因为如此，方位词成了很能体现汉语特征的核心词、基本词，所体现的特征则包括了词汇、语法和语音的各个方面。因此，对于汉语的方位词进行全方位的、深入的研究的重要意义，怎么强调也不为过。

陈瑶对汉语官话方言方位词的地理分布与历史来源进行研究，既很有眼力，也很有胆量。有眼力才能看到研究这个课题的意义，有胆量才敢于挑战它。经过三年的努力，在撰写《官话方言方位词比较研究》的博士论文中，她已经把方位词的问题摸了一遍，深知方位词虽少，牵连的问题却很多，历来的研究虽然有很多成绩，也存在不少问题。她选择了官话方言的范围，就常用的方位词进行词汇学研究。在周密调查了已有的关于方位词的研究成果之后，她确定了6个最常用的单纯方位词、14个合成的方位词进行研究，并拿这些方位词和35个常用的、有代表性的名词组成了69个方位结构，并以这69个方位结构为主体构造了69个典型的调查例句。以此为依据对象，她选择了11个官话方言点，先找当地中年人做调查，而后进行各方言点的异同比较，同时也与《现代汉语词典》和

《现代汉语八百词》所标记的普通话做比较。不仅如此，她还把这些官话方言的方位词和其余南方方言以及古代汉语的方位词进行比较，探求各种用法的形成年代和在现代方言的分布。因此，2001年她的博士论文得到了好评，顺利通过了答辩。

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陈瑶进一步补充修改，抽出其中最具特色的若干问题，更加集中地进行古今南北的深入比较，现在的这本书就是其经过多年的持续研究获得的一些成果。

本书的成功之处有以下五点：

第一，广泛阅读了新中国成立50年来关于汉语方位词的研究成果之后，作者所作的综述和总结评论是恰当的。“方位词研究概况”和百年“四方”的研究对已有的方位词研究的成就和存在问题都有准确的评述。如书中所指出，就方位词的研究来说，对现代汉语的研究较多，对古汉语的研究较少；对现代汉语通语的研究较多，方言的研究较少；从语法的角度研究较多，从词汇的角度研究较少；单点的、个别的方位词的研究较多，多点比较和整体的研究较少。应该说，这些情况至今还没有根本的变化，还值得引起同行的关注。

第二，该书的整个理论框架和调查研究工作的设计，都经过周密的思考，有妥善的安排。例如，把方位词的研究重点放在常用的单音词和带语缀的双音合成词上；在考察这些方位词的使用时，又把重点放在与常用名词的结合上；在方位词的词义方面，沿着“表空间—表时间—表范围”和虚化为表“方面”的方向扩展，这些内容安排和谋篇的处理都是很见功力的。在一般的调查研究基础上，发现有特色的语言现象后作者又能将其作为“专题讨论”的重点问题进行深入的分析，例如以“头”表“里”，以“高头”表“上面”，以“肚里”表“里面”。这种有重点的研究更便于发现语言现象中的特征，而特征研究正是语言研究中最应该追求的目标。

第三，研究始于调查，本书的工作值得称道的首先是广泛、深

入的调查。没有周密的调查，一切研究都是空话。作者所做的调查，包括已有研究成果的调查和约请专人做调查。对已有语料的调查遍及多种大型辞书：《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41卷)、《汉语方言大词典》、《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汇集》、《汉语大词典》等，所选的11个官话方言点则约请了专人反复询问校订。方位词往往词义繁多，用法复杂，为了各点语料能够对齐，作者都把方位词放在同样的词句中去比较，例如，“地下”就还有“掉到地下(地上)”和“埋到地下(地底下)”的不同。由于调查工作做得比较细致，本书所提供的语料应该说是相当可靠的。

第四，本书最可贵的成功是没有停留于语料的罗列，而是努力开展纵横两向的比较研究。应该说，调查只是方言研究的基础工作，只有比较才是方言研究真正的开始。方言是语言的地域变体，是方言差异的集合，只有通过比较才能发现方言的特征，理解不同方言之间的异同。横向的比较是拿普通话的说法和各地官话方言做比较，和非官话的方言做比较，从而了解方言和普通话的不同关系；纵向的比较是拿方言和不同时期的古汉语做比较，以了解方言在汉语发展过程中的层次关系。正由于纵横两向的比较做得好，本书对不少汉语方位词的特征所做的专题分析都很有说服力，取得了学术上的突破。例如：

“高头”表示“上面”，据调查，分布在全国17个省的120个县市。在官话方言中，除了东北官话和胶辽官话之外，各地都有，主要集中在中原和南边的西南、江淮官话，在非官话中还见于吴、徽、湘、赣、晋等方言。从历史上看，“高头”唐代就有用例，但常与“高处”同义互用，宋元之后，“头”逐渐虚化作为语缀，“高头”便取代了“高处”，但明清之后又不敌“上面”的扩展，并没有进入通语，成为比较广泛存在的方言词。这一过程说明了方言口语往往是产生新词的温床，但是新生的方言词能否进入通语，是要进行一番竞争的，只有竞争的胜者才能进入通语。

“头”表“里”义，在现代方言里，多见于南方的西南官话、江淮官话和部分吴语和粤语中，例如“河头(河里)”、“夜头(夜里)”、“心头(心里)”。从历史上说，表方位的“里”早在汉代就出现了，并一直沿用下来。“头”表“里”义则产生于南北朝，“从南北朝到宋代这段时间，[‘头’]是一个能表多种方位的方位词，而宋代以后，‘头’表方位的表义功能逐渐消失”，首先退出长江以北的官话，而保存在南方方言中。这是另一种方言词和通语的竞争，局部地区产生的方言词没有造成对通语的冲击，但保持了一定的通行地区。

关于武汉、红安把“里面”说成“窠里”，正是参考了湘语(长沙、双峰等)、赣语(南昌、萍乡等)、客语(武平武东)、吴语(丹阳)等地写为“肚里”的情况。作者指出武汉话由于“浊上归去，阴阳去不分，于是浊上的肚、窠同调，又姥韵读[ou]、混入侯韵，于是肚、窠同音”，加上字义形上的关系的分析，从而认定“窠里”应该就是“肚里”。由此可见，不同方言之间词汇的比较，有音义的正确比较，就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关于用“上”表示时间义——7岁上(7岁的时候)，官话方言的调查只发现中原官话(洛阳)和胶辽官话(牟平)有这种说法，而普通话已经把这种表达视为规范。经过近代汉语的调查，从宋代的《五灯会元》、元代的《西厢记》，直到明代的《醒世恒言》、清代的《红楼梦》都有用例，从而说明并非这种说法产生得晚，而是因为中原官话的说法并未在各地官话普遍通行，但写进近代汉语的书面语了，便流传于近代白话，并跟着进入了现代普通话。这也许是近代汉语词汇转为现代汉语的另一条蹊径。

第五，方位词虽然只是数量不多的小词类，但是因为常用和组合能力强，其演变发展牵连到语音、词汇和语法各个方面，不论在方言之间的差异，还是在不同时期的汉语的差异上都具有特征意义。本书通过现代官话方言方位词的比较研究，对于不同的官话方

言区的差异和远近关系，也获得了比较接近已知事实的理解。作者根据官话方言各区在方位词上的不同表现，把官话方言分为东-北区和西-南区。前者又各分为二：北京官话和东北官话（北京、哈尔滨）是最为接近的一片，中原官话和胶辽官话（洛阳、济南、牟平）是比较接近的另一片；后者也分为两片：南边的西南官话和江淮官话（武汉、成都、扬州）相近，北边的西安、兰州和太原与南边差别较大，太原尤其特殊。由此可见，放宽一点，把晋语归入官话方言也是可以的，从严一点，让晋语分立于官话方言之外也无不可。这样的结论和一般对官话方言之间的关系的理解是十分贴近的。作为方言的特征的方位词，只要认真进行比较分析，所得结论对于检验方言的分区，还是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的。

汉语的方言非常多样复杂，数千年的汉语文献也浩如烟海，说有容易说无难。方位词虽说只是有限的几个，要穷尽其在古今汉语、南北方言的表现，简直是做不到的。本书经过多年的努力，能有这样的成绩，就是很可喜的了。仔细检验，可能还有不周全之处，但敢于迈出纵横两向的比较这一步，获得一批新的认识，就应该给予鼓励。今后关于汉语方位词的研究肯定要有更大的规模，要贯通古今汉语和南北方言。但这本书作为进一步研究方位词的新起点，我认为它出版也是很有意义的。

厦门大学教授 李如龙

2014年9月25日

自序

我之所以要出版这本书，是因为它是我到深圳后从事汉语教学和研究的一个总结。1998年承蒙李如龙恩师不弃，我开始从事方言的研究。李老师根据我硕士期间在华中师范大学萧国政老师指导下专攻语法及是地道的武汉人的特点，给我确定了研究汉语官话方言方位词这个方向。到2001年博士毕业，我一直从事汉语官话方言方位词的研究工作，并撰写完成了博士论文《官话方言方位词比较研究》，这就是这本书的雏形。

毕业以后，尽管工作繁忙，我始终没有放弃汉语方言方位词的研究，李老师也一直鼓励我要坚持自己的研究工作。因此，从2001—2009年，我又进一步对论文进行补充修改，一方面继续关注汉语方位词研究的发展状况，如就近百年来“四方”的研究进行了细致深入的梳理；另一方面，就其中最具特色的若干问题更集中地进行古今南北的分析研究，如探究汉语方言方位词“头”、“高头”的历史来源与方言分布；方位概念“上”、“里”、“四方”在方言（尤其是官话方言）中的表达形式。这些研究拓展了汉语方言方位词的研究范围，加深了我们对汉语方言方位词的了解。在本书出版之际，我也敝帚自珍地将这些研究成果融入书中，使本书的研究更加丰满。

从2009年到现在，我指导深圳大学文学院的研究生做了一系列相关论文，在教学相长的过程中，进一步认识到汉语方言方位词的研究大有可为：不仅可以从方言方位词的构成、功能、地域分

布、历史来源进行传统研究，而且还可以运用认知语言学的方法对方言方位词的构成和功能进行现代研究。后者能给认知语言学的理论提供丰富有力的方言佐证，从而使方言方位词的研究能纳入世界语言研究的行列，使汉语方言的研究在世界语言的研究中占有一席之地。

在笔耕不辍的同时，我也很幸运地拥有了一个幸福的家庭。之所以能安心地进行学术研究，首先，要感谢我的爱人，他给了我一个安定的生活环境，使我能摒弃世俗杂念，潜心研究；其次，要感谢我的父母，他们从2006年我怀孕到2010年，在我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放弃了武汉安逸的生活，不远千里来到深圳，帮我抚育了我年幼的女儿；再次，我要感谢我的女儿，女儿的降临使我感受到做母亲的幸福和责任，这是我人生中最宝贵也最值得珍惜的一部分。每当要退缩的时候，我都会想起我的女儿，想到需要承担的生活和工作的责任。同时，我也要感谢我的弟弟和武汉大学出版社的各位编辑同志，是我弟弟为这本书的出版全力奔走，是各位编辑同志不辞劳苦、精益求精地校准书稿。

当然，更要感谢我的两位授业恩师，一位是我的硕士生导师萧国政先生，是他引领我进入学术研究的大门，并教授我语言研究的方法，使我能学术研究的道路上走到现在；一位是我的博士生导师李如龙先生，是他让我进入了方言研究这个神奇的世界，并让我在这个世界里探寻到无尽的宝藏，使我能将方言方位词的研究进行到底。

同时，我还要感谢：

潘家懿教授，是他在实地调查过程中，给我解答了一个又一个难题；也是他在教学任务较多的情况下，抽出大量时间，与我研讨论文的相关问题，并认真审阅了我的博士论文初稿，提出了宝贵的意见。

苏新春教授，是他多次与我研讨论文的相关问题；也是他审阅

了我的博士论文初稿，并提出了中肯的意见。

罗福腾教授，是他在千里之外无私地给我提供了牟平方位词的调查材料，体现出一个学者的宽阔胸襟。

陈晓锦教授，是她将其保存完好的《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的《汉语方言词汇调查表》借给了我，使我在选定名词条目时能有的放矢。

伍巍教授，是他开设的国际音标课程，让我领略到语音的丰富变化；也是他对我的学业提出了不少积极的意见和建议。

龚群虎教授，是他在百忙之中接受了我的调查，并耐心解答了我提出的每一个问题，同时还为我提供了关中方言的相关材料。

邵宜教授，是他在我博士论文的送审、论文答辩的过程中倾力奔走，使我及时获悉了有关论文的各种反馈信息。

庄初升教授，是他在我博士毕业后与我研讨汉语方言方位词研究的相关问题，使我能将方位词的研究进行得更深入，并能有机会将研究成果发表在学术期刊上。

张双庆教授、施其生教授、彭小川教授、鲍厚星教授等答辩委员在我博士论文答辩中，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和殷切的希望，激发我进一步完善博士论文并写成此书。

曹兆兰教授，是她在我孩子尚幼的时候，在工作上鼓励并帮助我。

周明艳教授，是她在我处于人生的十字路口时，给我指引了前进的方向。

张卫东、刘丽川教授，是他们从我工作到现在一直关心我的成长。

王晓均教授，是他放下手头的工作，不厌其烦地给我核实了西安方言的语料。

龚巧华教授，是她当时让她远在北京的70多岁高龄的姐姐接受我的调查，提供了地道的北京方言语料。

华中师范大学语言学系、暨南大学中文系、厦门大学中文系的各位老师，是他们在从事语言研究的最初八年中给我营造了一个良好的学术氛围，在这样的“自由空气”中，我这只“小小鸟”才能抖动稚嫩的翅膀越飞越高。

深圳大学师范学院的各级领导，是他们在在职攻博期间为我提供了各种便利；深圳大学师范学院中文系的各位同事，是他们帮我分担了大部分的教学工作，使我能潜心治学，也是他们在我怀孕生产期间，给了我最大的关照，使我能够顺利完成从一个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愤青到成熟女性的蜕变过程。

深圳大学文学院的景海峰、杨东林、相南翔、范晓燕、张剑滨等各位领导和陈剑华、胡旭梅、左英姿等老师，尤其是语言学的同行汤志祥、段书伟、梁源、詹勇、宫钦第、杨爱姣、丘学强、张静、梁立勇、左江、牛鹏涛，是他们共同营造了一个严谨治学的氛围，让我不敢有丝毫的懈怠，在学术研究的道路上奋力前行。

一本书的出版就像一个孩子的落地，历经磨难但充满喜悦；一本书的出版就是一个心灵的放飞，历经苦痛但充满感激！感谢所有曾经帮助过、关心过我的人！

陈瑶

2014年9月10日于深圳大学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1
一、方位词研究概况	1
二、本书的研究对象、目的及方法	14
(一)研究对象	14
(二)研究目的和方法	18
三、研究材料及调查方法	19
(一)调查点的确定	19
(二)调查例句的制定	21
(三)调查的方法	27
参考文献	28
第二章 官话方位结构中的单纯方位词比较研究	33
一、普通话单纯方位词的表义特点	33
(一)位置义	33
(二)时间义	34
(三)范围义	34
(四)虚化义	35
二、官话单纯方位词的形式特点	39
(一)表达位置义的官话单纯方位词的形式特点	39
(二)表达时间义的官话单纯方位词的形式特点	49
(三)表达范围义的官话单纯方位词的形式特点	52

(四)表达虚化义的官话单纯方位词的形式特点	54
三、专题讨论	72
(一)单纯方位词“头”的方言分布与历史来源	72
(二)西安话的“[·xa]”或“[·a]”的本字	81
四、本章小结	83
(一)官话单纯方位词的形式特点	84
(二)官话单纯方位词与普通话单纯方位词在 形式上的异同	85
参考文献	86
第三章 官话单用合成方位词比较研究	88
一、普通话Ⅰ类方位词的形式特点	89
二、官话Ⅰ类方位词的形式特点	90
(一)官话A类方位词的形式特点	90
(二)官话B类方位词的形式特点	101
(三)本节小结	109
三、普通话Ⅱ类方位词的形式特点	117
(一)普通话“中”类方位词的形式特点	117
(二)普通话“旁”类方位词的形式特点	118
四、官话Ⅱ类方位词的形式特点	119
(一)官话“中”类方位词的形式特点	119
(二)官话“旁”类方位词的形式特点	122
(三)本节小结	125
五、专题讨论	126
(一)官话Ⅰ类方位词的专题讨论	126
(二)官话Ⅱ类方位词的专题讨论	142
六、官话内部在单用合成方位词形式上的关系	147
(一)分组的方法	148

(二)官话 14 类单用合成方位词的分组情况	150
(三)官话内部在单用合成方位词形式上的分片结果	163
七、本章小结	172
参考文献	175
余 论	176
一、本书主要结论	176
二、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177
(一)官话研究有待深入	177
(二)南北比较亟待加强	177
(三)古今比较任重道远	178
(四)词汇分区势在必行	178
三、方言方位词研究的新视角：以“四方”为例	179
(一)“四方”研究概况	179
(二)北方官话“四方”的表达形式	187
参考文献	198
附录一：《现汉》单音名词与单纯方位词组合成的 凝固性方位结构(78 个)	200
附录二：调查对象情况表(截至 2000 年)	206
附录三：官话方位结构中的单纯方位词的调查例句 (69 句)	208
后 记	212

第一章 绪 论

一、方位词研究概况

50年(1949—1999)来,方位词研究的特点如下^①:

第一,从研究范畴来看,方位词主要划归语法学的范畴而不是词汇学的范畴。

50年来,“方位词”主要是作为语法学的研究对象,而不是作为词汇学的研究对象而存在。

一方面,综观语法学的专著,“方位词”往往是作为名词的附类、小类或者作为与名词并列的一类体词(或实词、或实体词)用专章或专节来研究的。如文炼^[1]就用了五分之一的篇幅来专门研究方位词和方位短语。另一方面,50年来研究的侧重点也放在方位词与名词、助词、形容词、副词在语法功能上的异同,方位词与处所词、时间词在语法功能上的异同,方位词与名词构成的方位短

^① 据我们研究,近15年(2000—2014),除了运用认知理论对汉语方位词进行阐释方面的论文在数量上有较大幅度的增加外,汉语方位词的研究状况与前50年(1949—1999)相比仍没有根本性的变化(参见:陈瑶. 认知理论在方位词研究中的运用和价值[C]//广东省中国语言学会,澳门大学中文系. 第三届汉语语法南粤论坛会议资料. 澳门:澳门大学中文系,2010:11.)。由于本书仍采用传统语言学的比较法来研究汉语官话方言方位词,因此,只对前50年汉语方位词的研究状况进行描述和分析。